

第十二章

伪满与日本蚕食华北

关东军入关与塘沽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我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既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又把东北作为扩大侵华和称霸亚洲的有力基地。这两个方面是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的。本书前面曾经述及，1931年11月关东军在制造天津事变的时候，就曾计划在华北同时下手，酿成席卷华北的大暴动，以便在占领东北的同时，也吃掉华北整块地盘。只因当时土肥原事先准备失误，失去战机，加以中国方面及时有力抗击，其阴谋未能得逞。但在一年多以后，关东军在进攻热河时，再次推行同时侵犯华北的方针。有资料说，当时“在关东军内部希望在华北和蒙疆成立亲日政权的空气开始抬头。”^①岂止是希望，而是非常具体的侵略行径。1933年2月23日，关东军司令官在其指挥部队开始向热河大规模进兵时，即发表《声明》声称：只要中国方面进行抵抗，就“不得不将战祸波及华北”。^②这不啻为对中国的宣战书。所以，当关东军于1933年3月4日晨占领承德

① 【日】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133页。

② 陆军省报道班：《热河省讨伐经过概要》，1933年12月，第5～6页。

后，参加进攻热河的关东军各部立即全线展开夺取长城各个关口的进攻：第八师团对古北口；混成第十四旅团对喜峰口；混成第三十三旅团对冷口和义院口，后来第六师团也参加了对冷口的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给其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制造借口说，这是“关东军为了履行日满议定书及其附属换文的义务所必须的作战行动。”还扯谎称，这一“扫匪工作”是1933年4月10日才开始的。^①

热河失陷后，张学良的军委北平分会主任为何应钦所代替，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变成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口号。当时，集结在喜峰口、冷口、罗文峪等长城沿线，有华北军、山西军、中央军、义勇军等大量中国军队，加上平津一带的驻军，共有20个师。^②他们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声援下，积极反击敌人，在从山海关起的长城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特别是3月中旬，在喜峰口和遵化北部罗文峪的战斗中，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于是，关东军转向商震部所守卫的冷口方面重点进攻，4月10日经一整天的激战，冷口失陷。与此同时，关东军越过长城，于河北省东北部滦河东部地区，进行所谓“滦东作战”，以策应整个长城线的进攻。4月11日，第六师团越过长城，向滦河一线进攻，夺取迁安。于是，防守喜峰口之第二十九军因腹背受敌，不得不撤至通州以东。4月21日起，关东军向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进攻。迎战的是第十七军二十五师关征麟部，战斗十

① 满铁经济会外事班调查员真锅康治：《从国际法角度来观察的停战协定及关系诸协定的研究》，1935年6月20日，特秘，打字件。

② 当时华北军宋哲元二十九军主力守卫长城南之玉田、三河；商震军在警戒山海关与海上的同时，主力置滦河一线；山西军以张家口为中心向古北口和热河以西多伦方面部署；国民政府中央军2个师北上，其中1个师用于古北口。

分激烈。4月24日，“敌自早六时起以飞机六架，并集中炮火向我南天门左翼某高地轰击”，“激战三小时，肉搏五六次，敌人虽伤亡枕藉，仍节节进逼”，我军阵地失而复得，“但至下午三时，敌仍以飞机六架并集中猛烈炮火，掩护其步兵向我南天门正面阵地猛烈进攻。”^①经7昼夜激战，南天门终于失陷。于是，中国军队开始后撤，特别是商震第三十二军向平谷、三河一线转进，其李吉村师已到达通州。^②

自5月初起，关东军更加疯狂，除第八师团继续向石门匣方面进攻外，在东线，关东军司令官则命令混成第十四旅团、步兵第五十联队和第十四师团的第一旅团司令部与骑兵、炮兵联队，统归第六师团指挥，占领永安和迁安，并由迁安上流地区，用主力给中国军队以“打击”。^③5月11日，关东军在西线占领石匣镇。在东线，第六师团也从罗家屯方面，击破了王以哲部的左翼，一路向丰润进攻。混成第十四旅团，则开始了对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主力的进攻。正当关东军用当年进攻旅顺的办法进攻密云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指挥者何应钦不组织抵抗，而是下令退却。

关东军在疯狂进攻的同时，还紧张地大搞政治谋略。活动中心是天津特务机关；核心人物是来自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④；指挥

① 1933年4月24日何应钦致南京各院部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② 按4月30日何应钦的新部署，除商震部做如上移动外，万福麟第五十七、六十七两军任滦河线之守，主力仍置西岸，第五十三军在唐山，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如旧，但须形成左翼重点；萧之楚部进占兴隆县及荞麦岭土城头一带，然后以一部守兴隆，主力转进墙子路，归徐庭瑤指挥；傅作义指挥的一个军，在昌平一带集结。此项部署，名为防备关东军兵力转移，实乃建立防守平津的态势。

③ 关东军命令，关作命第503号。《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し书房，第541页。

④ 板垣特由奉天特务机关长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

自当是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参谋本部。他们借助当时行使的军事压力，指使张敬尧^①一伙发动政变，制造亲日政权。第一次是拟于4月27日发动，未遂；5月初，日本参谋本部又执意实施军事行动“辅助手段的华北施策”^②，结果因走狗张敬尧5月7日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被暗杀而归于失败。

国民政府当局既慑于关东军的疯狂进攻，又恐惧天津特务机关制造的华北反蒋空气，故早在4月27日南天门失陷的时候，即通过日本驻沪武官试探停战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亲日派何应钦早在热河失陷时即已取代张学良任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5月4日又有老亲日派、已退居数年的非国民党员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以紧急推进停战。5月中旬何应钦即已同逼近平津的关东军暗中接触。5月21日，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联署密电蒋介石、汪精卫：“连日与对方迭次接洽。……拟请政府即将我军希冀和平、自动撤退情形，酌情通告各国，以为将来地步。”^③密电中虽然还说针对日方“态度陡变”的情势，“积极准备于白河附近决一死战”，实际上屈膝求和的大政方针业经确定。5月22日午夜黄郛闻讯23日拂晓关东军将“大举进攻”，便急忙“赴一私友处，不露声色，与中山代永津陆军武官、藤原海军武官彻夜讨论，天明始归”。^④黄郛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也是因为22日汪精卫有电示在先。汪电称“除签字于承认伪国、

① 张敬尧，又名勋臣，1880年生，安徽人，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从张作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顾问，1926年任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后无军职。

② 1933年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给关东军参谋长下达之《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43—544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826—2。

④ 1933年5月23日黄郛致蒋中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826—2。

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①当时——5月23日，来自绥远的傅作义第三十五军还在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阻击关东军，白刃格斗，流血牺牲；5月25日，军委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徐汉谋即奉命赴密云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在停战备忘录上签字。汪精卫等人既甘心充当投降派，又生怕沦为被人永世唾骂的千古罪人，所以总企望在停战协定文本上留有余地。^②可是，上校参谋徐汉谋到密云日军司令部签字时，关东军要求中国代表必须到日军军部“乞求正式停战”，而且出示的协定，只有日文本，并声称无修改余地。^③

1933年5月31日，中方代表熊斌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署《塘沽协定》，协定如下：

“一、中国军，即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① 1933年5月22日汪精卫致黄郛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826—2。

② 1933年5月24日蒋中正致何应钦等电，对停战“形诸文字”表示不安，特别对东北三省和热河“无意割让之承认尤为可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826—2。

③ 关东军司令部《华北停战交涉经过概要》，1933年6月。〔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21页。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①

这是自1915年“廿一条”条约以来，最为损伤中国尊严与利益的屈辱协定。它不但使国民政府“间接承认”了伪满洲国^②，而且使华北的一大块领土——冀东沦为中国不能行使主权，日方却可以任何方式，包括飞机侦察和“其他方法”进行活动的地区。日本侵略者私下不得不供认，《塘沽协定》，从字义上看是休战协定，但却“没有任何关于休止战斗的规定，相反从实际情况来看却多是降伏规定之类的内容。此外，如在停战地区内维持治安及其实施上我方的监督权、严禁挑衅和扰乱行为、禁止排外排日活动、日军对特定地区的驻兵权，以及其他许多干涉权的规定……这是设定我方势力范围的规约。”^③关东军在这个由他单方炮制迫使中方签字的“协定”，埋下许多伏笔，种下粒粒火种，以备进一步侵华大做文章。

关东军越过长城进犯华北时，李际春、程国瑞、刘桂堂、白坚武、王铁相等数万名各种牌号的伪匪军尾随其后。这些时而啸聚、时而溃散的民族败类和外国走狗，无恶不作。当时光是在北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940—941页。

②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华北停战交涉经过概要》承认，“协定”第三条使用“撤回长城线”（按日文本，下同）的提法意即令中国方面意识到，长城线具有伪满同中国的“国境”意义，再与第四条的“长城线以南”相对应，就是“取消中国方面对长城以北发言权，使之间接承认满洲国。”

③ 清铁经调会外事班调查员真桐麻治：《从国际法角度来观察的停战协定及关系诸协定的研究》，1935年6月20日，特秘，打字件。

宁铁路沿线与中国抗日军对峙并进行烧杀淫掠的郝鹏、白坚武、程国瑞、李际春等匪帮，就“号称四万人”。关东军操纵、利用伪匪军，固然是为了弥补兵力之不足，更重要的是政治谋略之所需。例如，原安徽省长、青帮土匪头子郝鹏，和天津事变时的便衣队头子李际春，受关东军唆使，都曾在其盘踞的地区“迫令商民悬五色旗”，阴谋推行“河北独立。”^①停战后伪匪军又被派上新的用场。《塘沽协定》第四条规定，在冀东“非武装区”

“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但“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为此，关东军于1933年7月3至5日，和7月16、17、19日，迫使国民政府华北政委会代表，与其举行大连会议和唐山会议，决定将伪匪军李际春部改编为驻屯于“非武装区”的保安警察队。即从李际春的“救国军”中抽出4000人，分别编成各以王铁相和赵雷为头目的第一、第二两个保安总队，驻于滦州和丰润。^②中国政府为此还支付了几十万元，而关于这部分武装的调动、指挥等，关东军始终进行所谓“监督”。对于其他伪匪军，日本侵略者也竭力与策划中的华北汉奸傀儡政权“合流”。^③

关东军之所以没有攻入平津，也没有继续前进，而接受停战，主要是恐惧英美干涉，同时也不无兵力不足问题。当时日本侵略者开始推行的对华战略是：打击抗日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建立亲日政权，不战而取全华北。而《塘沽协定》签定后的

① 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机密作战日志》。《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47页。北平军委分会战报，亦有此类记载。“五色旗”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用过的国旗。

② 1933年7月6日关东军司令部：《大连会议议事录》，1933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唐山会议决议事项》。均系油印原件。

③ 《塘沽协定》签定后，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动以亲日派冀察为中心，拼凑华北伪政权，并使其余伪军与之合流。

国民政府再也无法重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而是继续“剿共”，并开始采取对日绥靖政策。1933年9月庐山会议后，宋子文的外交部长为汪精卫所取代。亲日势力抬头。黄郛、殷同^①等人也在积极地为《塘沽协定》而奔走。继大连会议和唐山会议之后，1933年11月7至9日，应日方要求，又举行了北平会议。会议前一天抵平的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所提出的交涉草案，比《塘沽协定》的规定还要严峻，实质就是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同意关东军在华北驻屯。而黄郛、何应钦等人当时竟报告蒋介石、汪精卫，只要不出现伪满洲国的字样，就准备基本同意冈村的草案。为躲避人们的耳目，会议是在秘密之中悄悄进行，最后得出的是“不签字、不换文”的“协议事项”。其基本内容是：一、华北当局随着维持治安机能完善，尽速并完全接收“长城线以外的长城以南和以西地区”；二、华北当局在近期内，同意关东军在接收地区内的连接长城或邻近长城的地区，设置为处理交通、经济等各种事项所指定的必要机关，并为这些机关提供方便；三、华北当局同意借给近期内在接收区内驻屯日军所需土地和建筑物；四、为在长城内外建立交易、交通、通信等设施，华北当局指定必要的委员同关东军指定的委员尽快进行协商。^②关于第二项的各种机构设置地点是：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岭口；第三项的日军驻屯地点是：山海关、石门砦、建昌营、冷口、喜峰口、木兰峪、古北口。事

① 殷同，又名桐声，江苏江阴人，时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辅佐黄郛进行中日交涉。

② 满铁经济会外事班调查员真锅藤治：《从国际法角度来观察的停战协定及关系诸协定的研究》，1935年6月20日。附件4，关于停战协定善后处理的北平会议。

后，中方对如上的“协议”还曾提出所谓“希望事项”，诸如：关东军在接收区内不干预中国行政，其他正规军不得进入停战区，华北当局在察东和多伦自由讨伐等，均遭拒绝。后来，1934年7月1日和1935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也先后被迫同意与伪满通车和通邮。

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

经过数次交涉，到1934年2月，中国方面才算办完了所谓战区接收，关东军也才陆续撤完。但是，关东军不但在“战区”一些地方留驻一部分部队，设置了“指定机关”和特务机关、宪兵队、警备队等，而且撤退的主力部队之一第六师团也是撤退到邻近华北随时都可入关的锦州一带。所以《塘沽协定》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阴谋，是以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或者说，是在关东军的武力威胁与讹诈下进行。而且大部分侵略阴谋，都有关东军参加，甚至是主谋者。

《塘沽协定》签定后，关东军曾决定，以黄郛为中心一举实现华北的亲日政权。然而，《塘沽协定》的签定，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抗日爱国斗争空前高涨。^①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中的非亲日派，竭力试图借助于美英的政治、经济力量，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所推行的独霸中国的政策。然而，1934年4月17

^① 如，1933至1934年春，由沪返闽的第十九路军要求抗战，并与红军签定抗日作战初步协定；1934年春，上海30万人举行给反日烈士潘洪生送殡的抗日大示威；同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等3000人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发表，等等。

日日本发表强硬的“天羽声明”^①后，国民政府很快软化，在抵抗日本的侵略上毫无作为。于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狂人们更加有恃无恐，从暗杀到武装暴动，无所不用其极，使偌大一个华北，乌云密布，事件迭起，岌岌可危。1935年初，关东军一手制造了下面即将说到的察东事件。5月初，日方又借口两名报社社长被杀事件和所谓孙永勤事件进行新的要挟。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涛和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都是亲日份子，他们却分别于5月2日晚和5月8日凌晨在北洋饭店和白宅被暗杀身死。孙永勤则是奋战在热河和长城线上的抗日英雄，他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于1935年2月因受围剿而进入遵化境内。本来，4月20日关东军已通过驻平武官高桥坦通告北平军委分会代理委员长鲍文樾，将自行讨伐，并从24日起已采取行动，为此特从东北调了1个旅团。可是，日本侵略者却利用此事和两名报社社长被杀事件，作为向中方发难的借口。1935年5月29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平武官高桥坦访问了北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严重要求“清算蒋介石的二重政策”，提交了由11项要求构成的通牒。其内容包括：从华北撤出东北军、中央军、宪兵三团、国民党；严惩杀人者；赔偿被害人损失；解散排日团体，取缔排日教育；河北省政府迁移保定，等等。与此同时，驻北平武官室还以中国驻屯军名义发表声明称：“日本军基于条约的权力，有必要采取自卫行动。由此而产生的事态，其责任当然由中国方面来负。”^②在上

① 当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在“声明”中称，如果外国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②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日中事件的经过》，综合情报10之号外，1935年6月21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

海的矶谷驻华武官也向南京政府采取了同样行动。关东军则表态支持中国驻屯军。顿时软化的国民政府，经过6月1日的临时中央政治会议，6月4日何应钦答复了酒井参谋长。然而，日本政府决定“一举解决过去的一切悬案”。^①因而6月8日酒井又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将河北全省置于几乎与非武装区同样的状态”，撤回北平军委分会，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和一切杂牌军，解散全国蓝衣社和其他排日团体，并要求6月10日前必须答复。^②实际上，无论是日方的无理，还是国民政府的退让，都与关东军重兵压境有关。酒井发出最后通牒的前一天，6月8日关东军突然命令满铁动员人员和设施，向山海关火速集结军队。到12日，共有7列168辆军车的关东军集结完了。^③军事讹诈果然有效。关东军开始行动的翌日，6月9日汪精卫即电示何应钦：“全部答应日方要求”。10日下午，何应钦往访高桥正式回答，此即后来的所谓“何梅协定”。当夜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军委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的200人即由北平南撤汉口。由此，继冀东之后，国民政府的军政力是被排除河北省。

日本侵略者吞噬的目标是全华北，所以他们继续寻衅闹事，为制造亲日政权而大肆活动。“何梅协定”墨迹未干，6月27日就制造了炮打北京城的丰台事件。事件幕后总指挥是大特务土肥原，老巢在奉天。由于《塘沽协定》的签定，关东军不仅将其权限扩大到非武装区，而且大观模插手华北工作，将山海关、通州、唐山等地特务机关也划归奉天特务机关领导。而在“九一

①②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日中事件的经过》，综合情报10之号外，1935年6月21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

③ 满铁：《会社功绩概要》，打字本，第78～81页。

八”事变后，因晋升少将而被任为广岛第九旅团长的土肥原，经过一年半的军旅生活后，于1933年8月重又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他此次大大扩大了活动舞台。他们把华北闹得乌烟瘴气。报称：土肥原“只要他存心在什么地方计划暴动，那是必能实现的。”^①关于丰台事件，土肥原双管齐下：一手操纵黑龙会成员牛达富太郎，通过伪匪军头子王铁相策反在丰台的中国铁甲车队；一手唆使原吴佩孚的政务厅长、老牌汉奸白坚武收买铁甲车队。白坚武在日方指使下，为拼凑华北亲日伪政权，曾数次阴谋暗杀于学忠，并策动于的部下叛变，最后在沈阳成立了以分裂华北为目的的“正义社”和“正义军”。而丰台铁甲车大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原系石友三部下，由于石也是“正义社”成员，所以白坚武向段策反一拍即合。但是，当1935年6月27日开始行动时，中国军队预有准备，尽管牛达富太郎和王铁相等人都已登上铁甲车，但见永定门紧闭，城门上布满守军，便慌忙向城内乱发10余炮，逃窜而去，暴乱以失败而告终。

193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在华北虽然极其嚣张，但是并未完全得逞。丰台事件的失败只是其一。为了实现华北的“特殊化”，以“自治”为名网罗汉奸的活动，包括土肥原对吴佩孚、高桥坦对阎锡山和天津日军对宋哲元、孙传芳的策动，均未见效。因为，华北事变，特别是《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还是中国投降派的卖国企图，都难遂所愿。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狂人是不甘心的。1935年8月由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转任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少将，9

^① 《外交周报》，第3卷，第8期，1935年8月。

月24日在招待日本记者团的午餐会上，公然抛出强硬的爆炸性声明：要求“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把国民党部和国民政府全部排出华北，使“华北明朗化”，为此不惜诉诸武力。此举不仅震惊了中国，而且日本政府也出乎意料，因而不得不急忙调整和统一对华政策。其实，日本广田外相自1935年7月就草拟对华北新政策。多田声明发表后，1935年9月27至28日的四相会议和五省会议，被透露出来的对华“新政策”是，华北“目前不需要进行大手术的政治工作”，亦即暂不动武。^①1935年10月4日，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又达成对华政策的谅解。从此，便以要求中国对日亲善、承认伪满和共同防共为条件，向中国展开外交交涉。此即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其实质就是妄图使中国对外屈从日本“放弃依赖欧美”，不但承认伪满洲国，而且承认华北的特殊化，以“防共”之名，攫取内蒙即所谓“外蒙接壤地区”。^②由此可见，“广田三原则”并非是同关东军等军国主义份子所推行的“华北自治”阴谋背道而驰的，相反把推行“华北自治”正式纳入国策。

1935年10月20日，上述对华“新政策”尚在传达贯彻，关东军大特务土肥原和松室孝良竟又制造了一场香河暴动。当天，由香河劣绅指挥，以要求减税为名，2000暴民冲城，形成“携带枪械之变民”与县警保卫团间的互击。翌日，又有23名日本宪兵乘车进城，“一时枪声四起”，全城大乱。^③暴动前劣绅和日本浪人要挟县长：让出县城，由民众自动组织政府。显然这是“华北

① 清铁：《协和》，1935年11月1日，第157号。

② 1935年10月4日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谅解。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940~1945，下，第303~304页。

③ 天津《大公报》，1935年10月25日。

自治”阴谋之一幕。虽然事属中国内政，但是中国的当权者、河北省主席商震却必须向外国驻军首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寻求所谓“根本解决办法”。^①

香河暴动问题尚未了结，1935年11月，关东军再一次对华北进行军事威胁和讹诈，用兵之多和持续时间之长远超过6月那次行动。根据关东军下达的《关于华北时局的铁路军运计划》，满铁自11月12日起把10个列车共230辆车的关东军人员与装备，从公主岭和海城等地运抵山海关。^②这是对中国政府于11月3日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的反应。如所周知，国民政府自统一全国后，鉴于币制紊乱，白银大量外流，通货萎缩，物价下跌，经济危机加深，积极着手筹划币制改革。英国也曾拉拢日本共同向中国提供币制改革借款。而日本正在谋求独霸中国，表示冷淡。然而，中国突然发表，停止使用白银，集中法币准备金，实行以英国资本为后台，与英镑挂钩的通货体制。无疑这对日本是一大刺激。不过，关东军大军压境，不单是针对币制改革的，或者说是利用对币制改革的阻挠，以推进“华北自治”的侵略阴谋。1935年11月13日，即关东军向山海关集结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官以驻满大使身分给广田外相的传言称：对南京政府的政策“必须采取彻底的阻止手段。而其手段不是其他，就是乘此机会，一举断然进行华北工作。”“华北工作的最终目的在于，将华北各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从南京政权完全分离独立出来。”^③满铁也扯谎称“因

① 《北京日报》，1935年10月27日。

② 满铁：《会社功绩概要》，第59～62，78～81，88～90页。

③ 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09～310页。
11月8、9日驻华武官矶谷廉介、日本中央军部、外务省分别发表了反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声明。

南京政府实行白银国有令，使早已酝酿的华北自治运动突受激发。”^①的确，“华北自治”阴谋活动是“突受激发”，但那是侵略者阴谋制造出来的。在11月12日关东军集结山海关之前，日方又提出“根绝”“排日机关”的要求；山海关陈兵之后，“华北自治”活动更加猖狂，无以复加，形形色色的汉奸“自治”组织应运而生。11月25日，受日本人唆使的几百名流氓还围攻了在天津的河北省政府和公安局。11月27日，天津的华北驻屯军犹公然发表公告：“华北顷近之运动，乃因民众要求自治问题，故中国当局如以武力镇压实属徒劳。”^②前此，11月20日，有吉大使就华北问题、广田三原则等与蒋介石、张群等会谈时，还威胁称：“对最近华北的自治运动”，“中央一旦加以压制或武力镇压”，“关东军对此不能坐视”。^③就在这种“气氛”下，受日本唆使的汉奸殷汝耕^④，11月25日在通县拼凑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把冀东停战区的22县作为辖区，宣布脱离中央，实行“防共自治”，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此时，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也已完成撤退。

这种局面的出现，自然也是国民政府再次退让的结果。就在冀东伪政权出笼的几乎同时，12月18日国民政府在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置于中国一般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的管辖。这种迎合自然博得日方的欢心，说它“充满亲日反蒋气味”，“将与日本提携排除国民党等”。^⑤至于冀东傀儡，无非是日本

① 满铁：《会社功绩概要》，第89～90页。

② 天津《益世报》，1935年11月27日。

③ 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10～311页。

④ 殷汝耕，又名亦农，1885年生，浙江人，曾参加郭松龄反奉和浙江自治活动，《塘沽协定》签定后任冀宝区督察专员。

⑤ 《满洲报》，1935年12月10日。

侵略者手中的一个筹码。在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下，他们妄图用冀东傀儡迫使冀察委员会“亲日化”、傀儡化。日本政府为此而制定的方针是：“一俟冀察的自治大体稳定时，则尽快促使‘两个政权’合并，并把‘华北自治’扩大到华北五省，以实现其‘华北国’的黄粱梦”。^①为此，关东军特从伪满洲国调伪龙江省总务厅长永井四郎等8名日本人打入冀察委员会进行所谓“内部指导”。至于对冀东伪政权，毗连冀东的伪满第五军管区军事顾问部特派骑兵大尉田中巽等多名日本军官，任冀东保安队教官。1936年4月，冀东伪政权特派池宗墨访问伪满“敦睦友谊”、“答谢关东军”。5月伪满也派专使回访。两伙汉奸打得火热。日本侵略者在伪满大吹特吹的“王道乐土”，也开始“灌输于我冀东二十二县”了。^②

华北走私与兴中公司

《塘沽协定》后的冀东，不但沦为关东军特务们兴风作浪，阴谋进行华北分裂活动的罪恶渊藪，也成为日本大搞华北走私的交易市场。日本对华走私由来已久，特别是以旅大租借地为基地向中国内地的走私，自本世纪初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华的一项国策。时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华北走私更成为“华北自治”阴谋的经济手段之一，因而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中外为之咳叹。旅大，即所谓关东州，沦为日本的租借地后，非但大连海关长等由日本人充当，而且由海路运入大连口岸的货物免征

^① 1936年1月13日《华北处理大纲》。日本战史丛书《华北治安战》，中译本（1），第5页。

^② 《冀东日报》，1936年4月24日。

进口税；但从旅大租借地运往中国内地则须缴纳进口税。《会订大连海关试办章程》还规定，日本官员须设法杜绝走私漏税，并在这方面协助中国官员。^①“然而，事实上日本方面对此并无诚意采取适当有效措施。虽然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日本方面是采取将走私作为繁荣关东州之所需的政策的，默许走私。”^②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华北走私，不只是数量激增，而且发展到公开化、武装化的程度，其目的也不单是为了繁荣关东州经济。特别是《塘沽协定》签定和华北与伪满通车、通邮后，日本的华北走私更猖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冀东“非武装区”成了日本走私犯麋集的“天堂”。是时的走私路线有海路、陆路两条。前者主要经由大连，并主要走私日本货；后者主要经由锦热地区，日本货、伪满货都有。当时大连附近海面漂浮着12000只帆船。它们大部分参与走私。发货地点，先是大连露西亚町码头，后改为老虎滩、小平岛和关东州其它海岸。1933年8月，伪满洲国大连税关取消预缴税制度——一种防止走私的措施，即从大连出港时预缴半额进口税，到达目的地后出示纳税证，缴纳关税时扣除预缴额——后，帆船出港不受任何约束，走私船激增。机动船也参与走私，且其数量与日俱增。走私船停靠地点，虽以中国当局的取缔、监视状况为转移，经常变动，但其活动范围基本不超越秦皇岛至青岛之间。渤海湾适于走私帆船停靠的场所很多。特别在所谓“非武装区”的沿海，原来的两只武装监视船因停战协

① 该章程签定于1907年5月30日。见《中外旧约章汇编》，2，第394~397页。

② 清铁经调会第四部中滨义久：《关于修改租借地海关制度的方针》，1932年8月，打字稿。另外，1916年1月关东厅野波桐拓致函佐藤民政长官称，“在现行制度下，杜绝走私意味大连经济界的大危机，进而也危及满蒙政策，影响甚大。”

定而被停止使用，很容易靠岸。海路走私，规模越走越大，从单个商人发展到集团化、武装化。大走私集团设有统一机构，下辖采购、情报、运送、卸货、推销等各职能部门。陆路走私路线比较复杂。经由山海关向华北走私有两条线：一是从朝鲜经安东，由铁路到达山海关的前一站万家屯，一是从大连经瓦房店，再运到万家屯。这两条线都是在山海关逃税，然后再运至天津等地。走私物品，从华北向伪满，主要是现大洋，先在天津、北平、唐山等地集中，然后利用火车运到山海关，通过关卡后，在山海关的下一站万家屯再上火车，经朝鲜运往日本；从日本向华北，主要是人造丝、罗纱、卷烟纸。这些货物运抵万家屯后，先运到邻近山海关城的东罗屯开箱，然后雇用“苦力”背货通关。当时东罗屯拥有2000多名准备被雇用的“苦力”，每当午后，便以50、100或200名为一队，背负走私货物，由10至20名手持棍棒的日本人或朝鲜人随行，从东水门、南水门和海岸通过长城关门，遇有中国监视员阻拦时，随行的日本人和朝鲜人监督便成了打手团，殴打中国官员，强行通过。用人力运到秦皇岛的走私货，重新包装，利用铁路，运销各地。长城线上的九龙口、义院口、界岭口、冷口、古北口等，也都成了日本走私的途径，但以山海关为最。日本走私，公然施暴，以致中国海关人员被殴致伤、致残、致死的惨状，经常发生。^①

1935年下半年起，日本的华北走私更趋猖狂。武装走私团出现。此后，不但缉私人员常遭枪击，由天津等地转运走私货时也往往以武装押运，甚至以华北驻屯军名义，带军用护照，挂太阳

^① 上述日本走私情况，见满铁天津事务所高见信雄：《冀东区域贸易概况与关税情况》，华北经济资料，第5辑，1936年，第95～126页。

旗，公开进行，肆无忌惮。大规模的华北走私同日本对华中、华南走私相汇合，损害了正常贸易，打击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破坏了中国财政，动摇了中国金融。关税是当时中国的首位财源。据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80页统计表载：关税收所占比重从1932年的59.8%，下降到1936年的33.3%。1935年11月，即中国币制改革前，日本从华北走私外运的现大洋，每月达数百万元。所以，日本的华北走私确实是不费一兵一枪的侵华毒计。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首经叫嚣，把走私作为“对华的断然手段”，以“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的成立”。日本的华北走私的确不单是经济侵略问题，它也是政治阴谋。日本侵略者利用走私日本浪人滋事闹事，借口保护日侨而增兵，同时也妄图利用走私洋货和走私利益，瓦解中国的抗日营垒与意志。冯玉祥曾尖锐指出，日本对华走私是他们侵华、亡华的一项国策，是“制中国于死地的一个最毒辣的可怕的手段。”^①

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怂恿华北走私的政策措施，除上述1933年8月伪满大连税关取消预缴税制度外，冀东伪政权出笼后，又指使其在秦皇岛等5处设立了“查验所”，征收相当于当时中国现行税率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通过税”，并实行差别待遇，对日本以外的他国货，则课以相当中国关税百分之八十的税。这无异于公开批准走私。所以，到1936年，机动船走私几乎完全代替帆船走私，甚而出现了走私保险业，日本一流商社，诸如三井、三菱、伊藤忠等也都积极参与了走私。公开支持走私并使走私合法化的主谋，自当是关东军，它除妄图以走私为手段破坏中国政

^① 冯玉祥：《奇袭起来和敌人拚命》。《冯氏丛书》，6，上卷，第443—454页。

治经济形势、助长日本侵略势力外，经济上则把“通过税”的收入用于对内蒙的谋略活动。当然，被日本方面称之为冀东特殊贸易的华北走私，也势所必然地成为中日交涉的课题，但因日方以南京政府每月支付给冀察政权100万元补助金，和降低关税为条件，停止这种贸易，直到“七七”事变交涉毫无进展。

日本大肆进行华北走私，除商品倾销的经济目的外，在政治上是为了瓦解中国政治营垒，培植亲日势力。只是到了华北风云激变、日本侵华狂人的“华北自治”阴谋甚嚣尘上的1935年，作为经济侵华的手段，他们已不满足这一手了。当年，满铁大举向华北进军，并在冀东和冀察两个政权出现的几乎同时，1935年12月，由满铁全额出资，以华北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兴中公司设立。

满铁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推行大陆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出笼的结果，它“在满洲进行政治活动的任务”已告一段落，而在日本“积极向中国内地伸张方面”，又开始“负有更大的使命。”^①1935年3月，满铁向日本政府申请在华北设立兴中公司。5月，新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赴任前夕，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林銑十郎对其谈称：“我军之期望满铁成为向中国进行经济伸张的急先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恰当的。兴中公司即在此宗旨下策划设立的。”还说“兴中公司之能否担负起其肩负的任务，影响甚大。”^②1935年夏，中日关系最为紧张。8月2日，兴中公司的设立获得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批准后，广田外相也表态：“最近华北情况越发使我们感到有必

①② 1935年5月林陆军大臣同满铁新任总裁松冈洋右会谈基本内容（一）。
《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みすじ书房，第735～786页。

要设立这种服从统制的对华企业机关。”^①因此，兴中公司的性质自始就是十分明确的，它是日本政府和“像满铁这样的国家机关”的“对华政策代行机关”。那么，日本政府何以需要采取如此的曲线办法对华施策呢？原因是：他们感到，由政府或代表政府的机构如满铁充作对华经济政策的执行机关，“从目前的日中经济关系上看既不便也不利”^②；而如果让其他方面，例如民间资本或通过民间资本去实行，“又不能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进行活动。”^③至于兴中公司又何以拖延成立，而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诞生的第三天——1935年12月20日赶忙正式开张，是因为兴中公司就是要抓住像冀察委员会这样一个对手，在经济上与其结成“依赖关系”，在政治上迫使其“亲日化”。

资本1000万元，总店设在大连，由满铁全额出资，直接指挥监督，与满铁系异名同体的兴中公司，虽为日本国策执行机关，却以普通法人面貌出现。不过，在活动上，除接受满铁的指挥监督外，外务省和驻华使馆也进行监督、指导，军部还直接间接插手。关于兴中公司活动的总方针，1936年8月11日日本政府所确定的《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表述最为明确：“华北经济开发以民间资本的自由进出为宗旨，通过我方权益的伸张，构成以日华人经济利益一致为基础的日华不可分的事态，目的在于，平战两时使华北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国防上所需的军事资源（铁、煤、盐等）的开发，和与之有关联的交通电力等设施，必要时以

① 1935年8月8日广田外相致驻华若杉参事官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文档案抄件，108~279号。

② 《对华投资会社设立要纲》。《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设立书类集》，1942年8月，第547~549页。

③ 《对华投资会社设立要纲》。《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设立书类集》，1942年8月，第547~549页。

我方资本迅速期其实现。”^① 为了从经济上“使华北保持亲日态度”和掠取“国防上所需军事资源”，首先把铁煤等矿产资源作为重点目标，而以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冀东自治政府为对手和工具，并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口号而进行活动的。

埋藏量号称亿吨的龙烟铁矿，由龙关、烟筒山两个主要矿区所构成。1914年发现后，陆宗舆、段祺瑞创办了资本500万元的半官半民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开采后日产500~700吨，供应汉阳铁厂。翌年在北京西郊石景山建造高炉，旋因大战后的经济衰退而停止。1934年以来，它成了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1936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由兴中公司出面，满铁协助，获取龙烟矿权。由于冀察委员会已决定龙烟铁矿国有化，并任陆宗舆为恢复委员会督办，兴中公司便以天津的日本军部为后台，强行策动所谓“中日合办”。1936年末，冀察委员会虽被迫趋于妥协，但在“七七”事变前未能实现。

华北煤炭，无论藏量、产量均居全国之冠。尤其山西省，当时探明的储量即占全国之半。开滦、井陘和正丰煤，又都是适于炼铁的粘结性煤。但是，华北矿权所属复杂。最大的开滦煤矿为英国资本所经营。山东半岛的淄博等矿又早为日本资本所渗透。所以，兴中公司首先计划“把井陘、正丰的经营收归我手，以资炼铁”。^② 但井陘煤矿的利权早为德国资本所夺得。1908年清政府批准合办，德方为海军老将提督汉纳根，中方是井陘文生张凤起，资本50万两，中德各半。1922年矿权收归省有，签定改办合同，中国股四分之三，德国股四分之一。兴中公司根据日本政府

^①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47~348页。

^② 1936年12月11日兴中公司社长十河信二致对满事务局总裁寺内寿一函。满铁档案，总体，东亚，文书，关系会社，5-8，第7号。

指示，先“继承”德国股份，然后以“中日合办”形式夺入手中。1936年驻华北日军司令官田代中将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谋求签订所谓《华北经济开发备忘录》时，要求兴中公司先收买好井陘股份。经与德方代表巴尔交涉，1936年8月签署了合同，但收买款是1937年10月才交付的。邻近井陘的正丰、宝昌两煤矿，都由中国资本经营。1937年4月，兴中公司用24万元收买了前者。

冀东地区丰富的高矾粘土资源，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1937年6月，兴中公司通过操纵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通州特务机关，攫取了“统一管理开发”冀东粘土的特权，最后将59处矿区攫为己有。

华北沿海地区雨量少、地势平、气温高、蒸发力强，最适于晒盐。尤其渤海湾头白河两岸，自古即以长芦盐而著称。而需要工业用盐与日俱增的日本，急欲用华北盐取代其它进口盐。1936年6月，日本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四省共同决定：长芦盐进口命令由日本专卖局发布；进口业务统由兴中公司办理；天津总领事馆和中国驻屯军帮助“斡旋”。1936年当年即向日本出口7万吨长芦盐。

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华北各省盛产棉花，产量占全国之半，其内销和出口均与日本密切相关。不仅日本国内棉纺织业需要大量华北原棉，而且对在中国攫取了垄断地位的在华日资棉纺织业，华北原棉的供应，也具有决定意义。1936年6月，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达成谅解：设立以棉花收购、运输、内销、出口、融资、储藏为业务的华北棉花会社，并由外务省密令兴中公司“尽快创办”。兴中公司还积极向山西、山东直接伸手。作为兴中公司的“侧面机关”的通裕公司，专门从事棉花交易和农村活动，还利用青帮勾结经济界亲日势力。

在交通运输方面，兴中公司主要是图谋修筑津石铁路。这条铁路计划由来已久。1912年和1920年中国曾先后制定修筑计划，目的当然是振兴华北经济。后来满铁染指这条铁路，它的着眼点却是山西无比的煤炭，因为该路一旦修通便可与正太路接轨而直插山西腹地。所以，1929年7月满铁以日商华昌公司代表市吉彻夫出面与中国沧石铁路局长签定的1900万元的《沧石铁路借款契约》，是以获取山西煤炭销售独占权为条件的，但也正是这个使中国难以承受的条件，使契约化为废案。兴中公司成立后的1936年夏，中日关系已十分严峻，“日本痛感有必要在华北确保一条利权属于自己的铁路，于是想到实现沧石铁路的问题。”^①于是沧石铁路计划死灰复燃。因为天津系华北经济中心，邻近海口，又是日本侨民聚居地和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所以，驻天津日军部改为修筑津石铁路。但因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推拖躲避，计划又未得逞。

关东军制造伪蒙古国

关东军在侵略、割取华北的同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也干着同样勾当，手段、步骤如出一辙。1932年关东军就派参谋田中久率到锡林郭勒盟对索王进行策动，还要求在乌珠穆沁设立特务机关。当时，关东军在多伦已设有特务机关；在锡盟庙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已公开活动。1933年8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和越过长城出兵华北时，虽然没有直接踏进察蒙，但是关东军所豢养和操纵

^① 满铁调查部：《津石铁道建设计划案及参考资料》，1937年12月，第1～2页。

的伪匪军却被命令窜入多伦一带。当时的部署是：由冈田大尉操纵的李际春伪匪军以锦州为基地侵入滦东；由山东土匪在开鲁一带啸聚而成的刘桂堂伪护国军，从鲁北经林西侵入多伦一带，同一路还有原在通辽的拥有3000人马的李守信匪军。关东军利用伪匪军的窜扰，把对华北和对察蒙的侵略连接起来。为了更有效地操纵伪匪军使之充当马前卒，关东军竟以金钱为诱饵，伪匪军每前进一步就支付给一点钱款。《塘沽协定》签定后，李守信伪匪军的一部分被改编为伪满兴安西警备军，李守信本人则以中将军衔当上伪察东警备军司令官。这一支察东伪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察蒙地区进行谋略的主要帮凶军。后来李守信竟成了伪蒙军总司令和伪蒙政权的主要头目之一。

德穆楚克栋鲁普原系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古旗扎萨克郡王，简称德王，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这个年轻的蒙古王公是个狂热的民族分裂主义者，积极从事所谓“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而锡、察两盟又恰恰是“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西进的要冲，因而两者一拍即合。1934年秋，关东军在华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到苏旗活动。从此，德王便一面保持同国民政府的联系，一面与日本侵略者勾勾搭搭。1935年冬，德王在关东军的引诱下还亲自跑到伪满首都，面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关东军表示愿意帮助他在内蒙西部先搞个所谓“独立局面”，继而成立“蒙古国”，还答应送钱送枪，以编建伪军。

在这之前，1935年初发生了察东事件。关东军本已在察东侵占多伦，但又无时不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1935年1月，关东军声称察哈尔省沽源县属之长梁、乌尼河、南北石柱、永安堡、四道沟一带地方系伪满热河省丰宁县辖境，要求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西。其实，当时那里已无中国正规部队。1月19日，关

东军以丰宁县三好警务指导官所率领的警察和自卫队员遭到大滩南干顺店附近中国自卫团的袭击为借口，通过驻平武官向北平军委分会和政务委员会发出通牒：将对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开始讨伐。实际上，两天前驻热河承德的第七师团即组成了600人的所谓“讨伐队”。20日和21日，又有飞行中队、野炮中队和第十三旅团的大量兵力，经丰宁、大滩向沽源进发。1月23日，关东军声称宋哲元军拒不撤退，向东栅子、沽源方面出动飞机^①，致使当地自卫团和居民死亡40余人^②。关东军如此兴师动众，大逞淫威，主要企图是打通多伦至沽源的交通线，占领西进要地。关东军本来并未同中国军队接战，无所谓胜败，可是国民政府也进行妥协，与日方举行所谓大滩会谈，签定所谓“大滩口约”。据此，此后中国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不得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③日方承认，这一事件是关东军根据“长远考虑而采取的有计划行动”，而所谓“长远考虑”就是：“促进日满势力进入该地区”和“利用战区和察哈尔为缓冲地带”。^④

察东事件后，日伪在察东大设机关。李守信的察东伪警备军就是1935年3月在多伦设立司令部的。随之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也更加嚣张。1935年6月5日，德王同以商人自称的3个日本人从多伦到张北，日本人因无护照被守城卫兵扣留。于是日方说中国方面污辱日本人，并以此为借口进行要挟。当时，

①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察哈尔事件概要》，综合情报10第8号，1935年6月1日。关东军特从伪都新京调了数架重型轰炸机。

② 《国闻周报》，第12卷5期，1935年1月。

③ “大滩口约”，1935年2月2日由军委北平分会公布。

④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察哈尔事件概要》，综合情报10第8号，1935年6月1日。

“定协梅何”刚刚签定，墨迹未干，6月27日，国民政府又由秦德纯^①与关东军的土肥原签定屈辱的《秦土协定》。宋哲元被迫交出张北、宝昌等察东6县行政权。从而由冀东“非武装区”到察东“非武装区”，形成了实际由关东军一手控制的伪满洲国同中国内陆的所谓“缓冲地带”。和冀东的情形一样，第二十九军撤出察东后，察东6县名义上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实际上，关东军命令驻多伦的李守信伪察东警备军进行了占领。^②

张北事件后，关东军更加紧策动。1936年初德王便在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亲临下建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当时在德化已设有操纵伪蒙的特务机关。关东军的真正意图是，唆使德王建立伪蒙古军政府，而不能单是成立伪蒙古军司令部。因为冀东傀儡政权业已出笼，关东军急于在察蒙也造成同样态势。1936年4月24日，终于促使索王出面，在乌珠穆沁旗召开了有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人参加的第一次蒙古大会。根据会议所讨论的建立伪蒙古国和蒙古军政府、征兵扩军、实行经济统制等议案，1936年5月12日，在关东军今村参谋副长等人的亲临下，正式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云王、索王、沙王任正副主席，德王以总裁之职统揽大权。不过，实权掌握在以村谷彦治郎为首的顾问部，顾问部之上自然是关东军。伪军政府参谋长由总裁帮办李守信兼任。德王把李守信伪军、从伪满招募的兵、从锡察两盟招的兵合编为两个军8个师，德王本人和李守信分任第一、二军军长。

1935年冬德王赴伪都新京时，就会见了关东军参谋田中隆

① 秦德纯，又名绍文，山东沂水人，时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参谋长。

② 李伪军进犯沽源时，当地保安队曾奋起抵抗，击毙李军参谋长，但因关东军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保安队乃撤退。

吉，从此田中在操纵伪蒙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作为伪满洲国的延长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田中更极力用伪满影响伪蒙集团。为此，伪蒙古军政府出笼后，德王等人在田中的指使下，再赴伪都新京，同伪满签定了内容为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满蒙协定”。同年6月，伪满开始逐步撤销治外法权。借此机会，关东军与关东局达成协议，把原属关东局的200名警察派往内蒙，其中一部分在张北特别机关指挥下，训练伪蒙保安队。日本的蒙古善邻协会^①也以伪满洲国为基地，从1935年起兵分两路侵入锡察，以教育和医疗等为手段欺骗、怀柔蒙古民族，搜集情报，充当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手足。

关东军和德王都不满足于锡察两盟的有限地盘。所以，取代田中玖任德化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在伪蒙军政府成立后，积极策动伪蒙军西犯绥远。他利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制造伪满洲国的侵略经验，极力鼓动野心勃勃的德王等人。在他们看来，绥军不堪一击，只要西进，绥远唾手可得。伪蒙军的两个军8个师1万余人当时已初步编定。垂涎河套地区的王英匪帮，也在关东军指使下凑起“大汉义军”。按田中炮制的西攻计划，王英匪部在先，伪蒙军在后，把百灵庙作为后方军事基地。1936年11月5日，伪蒙突然向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发难，口实是绥蒙之间早已存在的税收等问题的摩擦。此后，不到10天便摆开阵势，同傅作义军兵戎相见。田中隆吉大佐还带去一支由关东军和伪满军组成的不大不小的特别兵团，参与其间。田中本人还亲自坐

^① 1933—1934年根据近卫文麿、荒木贞夫的宗旨设立，以善邻之美名，专门对中国的蒙族和回族进行怀柔、拉拢，妄图使其依附日本。1937年，为便于同伪蒙联系，东京的日本蒙古善邻协会分离出来独立的蒙古善邻协会，井上莲中将会长，其活动尤为广泛。

在飞机上在空中盘旋指挥。然而，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傅作义部队的军风纪和战斗力是闻名遐迩的。同时，在绥远不仅驻有傅部第三十五军，还有山西军的支援，兵力倍于德王和王英的伪匪军。尤其王英匪军更是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进攻仁格时很快溃败。李守信派兵进驻商都接替王匪对抗傅部后，后方基地百灵庙很快遭到傅部孙兰峰旅的袭击。守备百灵庙的是由新兵编成的战斗力更差的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伪蒙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命令死守。可是，当1936年11月23日傅部孙旅对百灵庙展开攻势时，烟草顾问和当地特务机关长却首先抱头鼠窜。傅军占领百灵庙后，王匪军妄图卷土重来，可是他在锡拉木伦庙的石玉山、金宪章两个旅，却杀死日本顾问，起义反正。正当此时，“双十二”事变发生，傅军奉命停止前进，使田中和德王免于灭顶之灾。伪蒙西犯的失败，使关东军和日本陆军丢脸。但是，他们并未停止对内蒙的谋略。田中隆吉被调走，继任者是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长武藤章，他以德化特务机关长的身分，继续贯彻关东军的侵略意图。

关东军指挥伪蒙军西犯也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日本侵略者正在悄悄地从阴谋“自治”转向以武力夺取华北。这是历史因果转换发展的必然。1935年末，冀东和冀察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出现后，日本侵略者寄予很大希望的冀察委员会，尽管有一批日本顾问打人，非但没有“亲日化”，相反“对日态度渐趋强硬”。^①急忙设立起来的兴中公司，虽也攫取了部分利权，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所以，1936年的华北，日本侵略的火药味更浓。一是自同年4月18日起，华北驻屯军升格，主力由两个大队增加到两

^① 冯玉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1936年8月12日在中央军官学校特训班讲话。《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三户社印行，1937年，第485页。

个联队，并成立隶属于华北驻屯军的步兵旅团司令部，此外还附有战车、骑兵、炮兵、工兵等部队；二是同年5月和8月，关东军先后被授权，不但可以将部队部署在“长城线外近处”^①，而且一旦需要重大军事进攻行动时，必须“迅速果断行动”。^②由此可见，关东军敢于指挥伪蒙军武力西犯，不是偶然的。当然“双十二”事变，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爱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升华。“双十二”事变预示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伟大历史局面即将到来。

① 1936年5月6日参谋总长《关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配置与任务的指示》。〔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406页。

② 1936年8月2日《参谋次长就作战问题与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星谈事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587～588页。